

· 中外文化交流 ·

《明实录》之东传朝鲜及其影响

孙 卫 国

朝鲜王朝（1392—1910）作为明、清时期（1368—1911）中国最为重要的藩国，政治上以明、清两朝为宗主国，文化上亦以儒家文化为依归，建立了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儒教王朝。朝鲜长期以来一直想方设法购求明、清书籍，朝鲜使臣出使之际，搜罗中国典籍是其必定的任务。随着儒教文化的日益深入人心，采购书籍就愈加活跃。世宗年间（1419—1450）主要由集贤殿负责书籍采购，朝鲜为振兴儒教文化而从明、清两朝购入许多书籍。英祖（1725—1776 年在位）五十二年（1776），朝鲜王室置奎章阁，以收藏图书，并置检书官，处理相关事务。检书官大多有出使燕京（朝鲜称清朝首都北京为燕京）的机会，并热衷于书籍的购进。这样，朝鲜购得许多书籍，即如正祖（1777—1800 年在位）曾命冬至使徐浩修以重价购得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达一万二千卷，^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而在朝鲜购入的众多书籍中，《明实录》则是个相当特别的例子，在中韩关系以至中韩文化交流史上都是件值得注意的事情。

《明实录》可以说是朝鲜王朝梦寐以求但却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朝鲜王朝原为明朝藩国，双方关系相当融洽，朝鲜以慕华、事大的心态对待明朝。明朝在日本丰臣秀吉 1592 年侵略朝鲜时，曾在

内忧外患相当严重的形势下，先后派兵二十三万人，历经七年（1592—1599），终于把日本军队打败，使朝鲜藩邦得以“再造”，从而使得朝鲜对明朝又产生了深深的感恩之情。但1637年，皇太极率兵征服朝鲜后，朝鲜由明朝藩国变成清朝藩国。虽然臣服了清朝，但朝鲜始终暗中与明朝保持联络。而1644年明朝灭亡后，朝鲜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倡导尊周思明的思想情感，尊周以尊明，思明以贬清。在明朝灭亡“周甲”（六十年）的1704年，朝鲜国王肃宗在宫中建大报坛，随后大报坛成为朝鲜历代国王崇祀明朝皇帝的圣地，先由崇祀明神宗而英祖时推及明太祖、明崇祯帝。朝鲜儒林则在性理学大师宋时烈（1607—1689）的倡导下，建万东庙于华阳洞，崇祀明神宗和明崇祯帝。而明遗民后裔也于19世纪建大统庙崇祀明朝三帝以及他们的祖先。朝鲜长期暗中采用明朝年号，编修许多明史书籍，表达其尊周思明的情感。举国上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沉溺于思明感恩的情怀之中。^②故而，详细记载明朝文物制度、礼乐典章的《明实录》的东传对于朝鲜王朝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。

1830年，朝鲜燕行使终于购得全套《明实录》，携归朝鲜，朝鲜王朝举国欢腾。日本学者小田省吾在20世纪30年代曾论及过朝鲜所藏之《明实录》，^③也就是1830年朝鲜所购得的那部《明实录》，但他只重其版本考订，未能将其置于整个朝鲜思明的环境下研究，且其所用资料亦有限，其文亦不易搜求，国人知之甚少，故而笔者在此重新讨论此事，以期学林认识到朝鲜王朝对《明实录》的热忱，并从中体察朝鲜思明之热切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热心。

对于《明实录》东传之事，当时随行的通事赵秀三（1762—1849）特作长篇《皇明实录歌》详载其经过。赵秀三，字芝园，号秋斋，一字景滩，一字子翼。生于英祖三十八年（1762），卒于宪宗十五年（1849），终年八十八岁。出身世代译官家庭。他曾六度出使清朝，以诗文见长，交游甚广。以八十三岁高龄进士及第。纯

祖二十九年（1829）冬，赵秀三随燕行使团出使北京。正是此次出使，使臣购得《明实录》东归，全帙运回。归国后，赵秀三即作长篇《皇明实录歌》，为见其全貌，先将其全文录之如次：

四百六十一卷明实纪，当时史才称谷氏。一统二百八十年，天启为终洪武始。礼乐刑政灿典章，山川郊庙精禋祀。祖宗功德奠九区，文谟武烈垂万祀。沧桑百变崇祯朝，呜呼帝亦明天子。大厦固难一木支，四十九相空唯唯。竖碑党籍有东林，执策赴乱无南史。但见爆火起金宫，未闻遗音传玉几。左有记事右记言，旧臣应泰今皇旨。犬衔膏烛秘书省，蝇头细字番黄纸。丰润之谷后式微，此本流落燕南市。三蚀神仙老脉望，瑟缩不敢来容嘴。槐肆虽非石室藏，神物守护犹相俟。朝鲜使者馆玉河，摩挲永叹穷朝晷。西堂书僮黠于鬼，察眉索价高如彼。不惜千金买全部，嗟哉李君慷慨士。史有邦禁不市人，闭门蜡炬中宵紫。老眼读尽天下书，纸上拭花编屈指。一字一涕涕无从，斗酒未浇胸喂礪。恭忆万历岁壬辰，蛮寇荐食同蛇豕。八道三都竞土崩，槩上儿啼羝人耳。帝赫斯怒命东征，鲸鳄讵肯受鞭箠。部中发白石尚书，李提督后杨经理。虎略鸿猷出为时，微二三公吾漆齿。岂意今夕亲见之，存亡肉骨恩浹髓。大车槛槛渡鸭江。箕尾仰看文虹起。拱北门开尺坛高，坛前日月尊阁度。上国文献在下邦，夏礼殷礼徵宋杞。不购象犀珠玉购此书，国富家贫心独喜。嗟哉李君慷慨士，天心感激嘉日尔。^④

《皇明实录歌》洋洋洒洒数百言，将此书购得经过、原来藏书者、《明实录》东传对朝鲜王朝的意义都给予了清晰的交代。细言之，从此诗中，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：

首先，诗言《明实录》有四百六十一卷，《前言》亦言：“皇明列朝实录，四百六十有一卷，自洪武至于天启，若崇祯实录，则以甲申之变，未暇纂述欤。”^⑤其所谓卷，应指册数，乃洪武到天启

十四朝实录四百六十一册。而《皇明实录厘记》称：

崇祯纪元后四庚寅春，使行入燕回，购皇明列朝实录二千八百二十五卷，共四百六十一册，赉来以进。书皆写本，纸故而蠹字不断烂。而标题以《皇明实录》，盖知为明旧藏也。谨考《明史艺文志》，其世次卷数悉相符。唯《艺文志》所在，《熹宗实录》八十四卷，此则阙焉。岂此本之写在天启年间故欤？^⑥

可见，此实录版本缺少熹宗朝实录，为四百六十一册，二千八百二十五卷，与现在通行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整理刊行的《明实录》版本并不相同。崇祯实录则未曾编修过。我们从下表中可以获知各朝实录与《明史艺文志》、中央研究院版本（下表作台湾本）实录之不同。

几种版本《明实录》卷数对照表^⑦

实录名称	朝鲜本卷数	明史艺文志	差异数	台湾本	差异数
太祖实录	394	357	+37	257	+137
成祖实录	267	130	+137	274	-7
仁宗实录	18	10	+8	10	+8
宣宗实录	115	115	0	115	0
英宗实录	397	361	+36	361	+36
宪宗实录	293	293	0	293	0
孝宗实录	224	224	0	224	0
武宗实录	197	197	0	197	0
世宗实录	564	566	-2	566	-2
穆宗实录	68	70	-2	70	-2
神宗实录	595	594	+1	596	-1
光宗实录	8	8	0	8	0
合计	3140	2925	+215	2971	+169

从上表可知：其一，以传入朝鲜版本之《明实录》卷数看，其卷数差别较大，总体而言，较之《明史艺文志》和现今通行之《明实录》版本卷数都要多，比《明史艺文志》所提供的卷数多出二百一十五卷，比现今通行版本多出一百六十九卷。差别最大的是《太祖实录》和《成祖实录》，有上百卷之差。其具体原因不好臆测，但或许在传抄过程中，出现衍生卷数，亦未可知。

其二，此书原为谷应泰（1620—1690）所有，谷氏为明末清初大史学家，有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传世。但身后式微，子孙未能保有藏书，使之流落书市，终于让朝鲜使者购得。诗中曰：“当时史才称谷氏。”“旧臣应泰今皇旨，犬衔膏烛秘书省。蝇头细字番黄纸，奉润之谷后式微，此本流落燕南市。”其《皇明实录歌前言》则称，“此书盖史馆旧藏，谷氏之所据修全史者，而后孙穷萎不能守，流落人间也。”^⑧可见，原为谷应泰所有，应无可疑。

其三，诗中对此书购入经过亦作了详细的交代。所谓：“朝鲜使者馆玉河，摩挲永叹穷朝晷，西堂书价黠于鬼，察眉索价高如彼，不惜千金买全部，嗟哉李君慷慨士。”由此看来，真正购得此书的是“李君”。前言对此有所交代，

岁乙丑冬，余从国使入燕，与李君锡汝同馆，李君以厚直沽诸书肆，属余编整讫，载以东归。^⑨

由此可见，购书的为李锡汝，而小田省吾所引之材料为：“余从国使入燕，与君镇九同馆。”《尊华录》中有《庚寅故事》，收录为《皇明实录》写序的金履阳为李镇九所写的序，明确说明乃李镇九购来实录，其曰：

纯祖三十三年，癸巳十月十六日，李知枢镇九将随使价赴燕，乞余一言以赠。……我东笃被神宗皇帝再造之恩，仅数世而天地翻覆矣。虽海外藩服之故，不能以封疆殉，而若其匪风下泉之思，愈久愈切，渐摩成俗，环数千里衣冠之族，莫不以大明遗民自命，是孰使之然哉？肆我孝明世子代听之

初，亦惟列圣朝志事是承，皇璫荐裸，率以躬无替。爰命胥译，购求明朝实录，予实膺命，而环顾四海无明久矣，夫孰有藏此书？苟藏之，又谁肯卖诸？然而予能于必不得之地，致必可得之诚，卒以全部实录四百六十一册齎进。^⑩

故而，锡汝与镇九应是同一人，李镇九就是李锡汝。

纯祖二十九年（己丑，1829）冬前往北京，而次年（庚寅，1830）春回朝鲜的有两批使团。一是进贺兼谢恩使团，贺展谒闕陵、谢赐笔、谢诏书顺付、谢赐物、谢陪臣参宴，未带方物。纯祖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出发，三十年庚寅三月二十一日己酉归来朝鲜的，正使李光文、副使韩耆裕、书状官姜时永、首译朴明嚙。第二批乃冬至使兼谢恩使行，谢进贺陪臣赐食、谢故副使加赏、谢恩无方物。纯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出发，次年三月二十四日还。正使判中枢柳相祚、副使礼曹判书洪义瑾、书状官兼掌令赵秉龟、首译官李时复。^⑪将《明实录》购回朝鲜的必此二使团之一。虽然《李朝实录》对使臣出使事项皆有详细的记载，但是，却丝毫未提《明实录》东传之事，这相当奇怪。因为每次使臣归来，都详细汇报相关见闻，《李朝实录》都有详细的记载，当然少不了对购来书籍的介绍，如实录中载录了购来的《明太祖御制文集》、王世贞《弇山堂别集》等等，但对于部头如此之大，而地位如此重要的《明实录》却无一笔涉及，这不能不说是极为反常的事。小田省吾推测乃是因为朝鲜担心将其载录于《李朝实录》中，怕引起清人的责问，故而故意略去。清朝对《明实录》的东传，一旦获知自然是极为不高兴的，很可能引发外交纠纷。赵秀三《皇明实录歌》即云“史有邦禁不示人”，清朝原本是禁止史书运出国门的，但是，连《明实录》如此大部头的史书都得以运出去，可见，这种禁令清朝并未严格施行，几形同一纸空文。《明实录》虽然运来了，而朝鲜亦喜亦忧的心态同时并存。购得之际，“闭门蜡烛中宵紫”，将那种喜忧参半的心态表露无遗。不过，把

《李朝实录》不载录的原因，推测为怕清人查问，并无很强的说服力。因为清朝根本无从看到《李朝实录》。《李朝实录》修完后，皆藏于史馆，朝鲜士大夫亦无机会看到，更不可能传到清朝去。似应有其他原因，但到底何因，笔者亦无从得知，只得存疑。

其四，《明实录》购来被视为朝鲜尊周思明的一大象征。朝鲜把《明实录》比作春秋鲁国所得之《周礼》，《皇明实录匣记》称：

今天下唯我东国独讲尊周之义，而得此书于崇祯甲申百八十七年之后，一开展而声明文物若身亲见，抚卷咨嗟，倍激风泉之感。^⑫

赵秀三诗中有言：“上国文献在下邦，夏礼殷礼征宋杞。”《承政院日记》则称：

追惟翼考风泉之感，江汉之思，撑宇宙而炳日星，可以永有辞于天下。而是书之东来亦可见天意之不偶然也。^⑬

前引《尊华录》所录《金履阳赠李知枢序》中，更有详细说明，强调《明实录》东传对于朝鲜尊周思明的影响，下文又曰：

《明实录》自洪武迄于天启以前三百年间礼乐刑政之具、兴衰得失之迹，该括无遗，灿然具载，宛若周礼之在鲁。嗟乎！是岂偶然也哉！……其为明故臣家藏无疑，然则卖之也意者，其藏之也，隐约而知我国思汉之故，欲其寿其传也欤！不然何誊写之辛苦，传家之久远，而一朝拟卖于外国，而莫之惜也。吾知天下亦自有思皇明而不忘者矣。^⑭

可见，无论是朝鲜王朝官方的史书，还是私家笔记、史书，都普遍认为《明实录》东传朝鲜正如“周礼尽在鲁”一般，《明实录》东传被看成是天意，这被认为是朝鲜尊周的一大象征。以为天既知朝鲜思明，故冥冥中，使朝鲜购得《明实录》，以慰其风泉之感、江汉之思，故对朝鲜数代以来之尊周思明是极大的推动。

其五，《明实录》运回朝鲜以后，即将其藏于大报坛敬奉阁。^⑮敬奉阁原在槐院，正祖时期以其破旧，圯之重建于大报坛西北角。

凡明代遗物，若明朝皇帝诏书、赐予朝鲜国王之蟒袍以及各种其他遗物皆收藏于此，如同朝鲜收藏明朝遗物的博物馆。朝鲜君臣上下皆将其视作珍宝。《明实录》运来朝鲜后，亦贮藏于此，此乃其诗所云“拱北门开尺坛高，坛前日月尊阁庋”之意。《明实录》藏在大报坛，正是朝鲜思明最为典型的地点，从而也表明《明实录》是朝鲜思明的一个重要象征之物。《明实录》对朝鲜来说，就如同周亡之后在鲁之《周礼》，朝鲜对《明实录》赋予极高的地位。故而后来，朝鲜好几次提议刊印此书，即便大韩帝国成立之际，对此书亦相当重视，大韩帝国皇帝高宗御制序文，颂扬其尊周大义。

《明实录》传入朝鲜四十余年后，高宗十二年（1875），领议政李最应提议刊行《明实录》。他认为明代三百年治法政谟皆载于此书，庋藏于敬奉阁，史局亦无副本，但原本则：岁月寝久，蠹鱼朽烂，在所当念。臣意则亟令馆阁诸臣分董印出，藏于皇坛及万东庙，以为次第流布，阐翼考积诚购奉之大义理，恐有光于殿下继述之道矣。^⑩

高宗虽表示支持，但是因部头太大，未能付诸行动。高宗十九年（光绪八年，1882）有大臣再上疏请求刊行《明实录》，高宗批曰：“《皇明实录》果是希本，俟物力稍叙，可议行矣。”^⑪在当时财政相当紧张、内忧外患之际，朝鲜大臣竟数次请求刊行《明实录》，只因部头太大，而财政又紧，方决定日后时机成熟之际再作刊行之事。而在大韩帝国成立不久，此事又引起注意，虽然最终并未刊行《明实录》，但毕竟对其进行了整理。

大韩帝国成立次年，光武二年（1898），韩国终于对《明实录》进行了整理。对原有版本改装修缮。编成新的目录，将其置于卷首。这样册数增加到四百六十四册。而整理过程中，发现原来所称卷数二千八百二十五卷不确，实为三千一百卷（确切卷数为三千一百四十卷），比原来卷数多出二百七十五卷，有见于此，参与整理实录的金履乔特作附记以说明此事。其曰：

右敬奉阁旧藏《皇明实录》，木匣所刻之文也。乃于光武二年春，修整总目录时，移录于首。而右文内有统举是书所藏皇明列朝实录卷数者，曰二千八百二十五卷，又曰谨考《明史艺文志》，其卷数悉相符。然第见此列朝实录，则实为三千一百卷，而不止于二千八百二十五卷而已。是曷故欤？盖计其相左之数，乃至二百七十五卷之多者，甚属可讶，今亦不敢不以原书所编卷数列载于总目录中，而又于每朝实录之末，各注其卷数与《艺文志》符与不符，以寓存疑之义。又以此总目录三册附于原帙，则其册数亦与右文异，为四百六十四册。

其卷数与《明史艺文志》卷数和现今通行版本卷数差异甚大，而此次整理过程中，大韩帝国皇帝光武帝亲作序文，其曰：

稽古一王之法二典尚矣，历夏、商至周，而礼乐法度灿然炳焉，文字悉备，《周礼》一书为治天下之模范，自两汉、晋、唐、宋以来，损益沿革不同，而要不出乎此，及大明而参酌于上下千载之间，辑而萃之，而又悉备焉。粤我翼考庚寅，行人得皇明列朝实录写本于南京（燕京？）。名山石室之藏，流转而东，玉带明堂图抑有待焉者耶？惟我国家祖述三代先王成宪，概取法于是，而朕尤致意焉。史策纪传诸志所载，盖出于实录，则是可以探其源而得其详。万机之暇，辄披览阁刀之文，每有益焉，有疑可质，确若准绳矣。其笔帙既钜，而其编辑舛差，条理棼错寻绎之际，艰于搜剔。乃为总目，叙其世次，开卷了然，便于考阅，如针引线。故纸蠹蚀断烂，字画率多亏缺，刀补葺缮写，庶无鸿乙三豕之谬。又改其缥緗而一新之，是书于是乎完矣。所以继先志而诏来许，子孙万世永宝重之。光武二年五月五日。^⑬

作为大韩帝国皇帝，虽然摆脱了清朝的控制，由清朝宗藩王国而成为独立的帝国，但对于明朝依然心存感恩，整理《明实录》作

为尊周的象征。不过，光武尊周，与其先祖们之尊周，已有本质的区别，此时，韩国倡导尊周，意在尊王攘夷，卫正斥邪，抵抗日本和西方势力入侵，维护正统与捍卫主权独立。尊周，永远是朝鲜王朝确保其民族独立精神的一种武器。

综上所述，《明实录》在纯祖三十年（1830）由朝鲜燕行使译者李镇九购回，此本实录原为谷应泰所有，后代子孙式微，使之流落书市，终由朝鲜购得。朝鲜君臣上下，对《明实录》东来相当重视，特将其藏于大报坛敬奉阁。四十余年后，左议政李最应等朝臣提议刊印，以广流传，最终虽然不了了之，但体现其君臣之重视。大韩帝国成立次年，光武帝指令对其整理，编出目录三册，并重新装订。光武帝亲撰序文，以叙其原委。《明实录》之所以引起朝鲜君臣上下的重视，在朝鲜王朝看来，《明实录》为明代礼乐文物之渊藪，得《明实录》就如同鲁国得《周礼》一般，是中华正统承继的象征，表明朝鲜承继了明朝以来的正统。《明实录》东传朝鲜，实际上是朝鲜后期尊周思明的又一件大事，这也是朝鲜君臣重视《明实录》的内在原因。

注：

①李元淳：《朝鲜赴京使行在文化史上的意义》，参见《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（台北：台湾韩国学研究会编，1981年），页346—350。

②对于具体情况参见本人博士论文《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之研究》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，2001年元月）。

③参见小田省吾：〈半岛现存の皇明实录に就て——纂史餘録——〉，《青丘学丛》（1933）第13号，页137—153；《〈半岛现存の皇明实录に就て〉补遗》，《青丘学丛》（1934）第14号，页96—99。另泉寿根据小田省吾文撰《朝鲜所藏〈明实录〉》，《大陆杂志》（1971），43卷6期，页56—57。

④⑤韩致远选编，赵秀三著：《秋庵诗钞》卷1，汉城大学奎章阁缩微胶卷83—16—327—1号。

⑥内阁提学金履乔作，洪建厚书：《皇明实录厘记》，转引小田省吾〈半

岛现存の皇明实录に就て——纂史餘録——》，《青丘学丛》第13号（1933年8月），页138。

⑦朝鲜版本之实录卷数依据小田省吾文所提供的数据为准。

⑧韩致远选编，赵秀三著：《秋庵诗钞》卷1，汉城大学奎章阁缩微胶卷83—16—327—1号。

⑨同上，《皇明实录歌前言》。

⑩宋秉稷编《尊华录》（汉城：骊江出版社，1985年）卷3《庚寅故事·金履阳赠李知枢序》，页237—239。

⑪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刊：《燕行录》（汉城：第一写真制版社，1962年）下册卷7，页1317。

⑫内阁提学金履乔作，洪建厚书：《皇明实录匣记》，转引小田省吾〈半岛现存の皇明实录に就て——纂史餘録——〉，《青丘学丛》第13号（1933年8月），页138。

⑬《承政院日记》（汉城：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，1967年），《高宗》五，页438～439。高宗十二年乙亥，十二月初五日。

⑭《尊华录》卷3《庚寅故事·金履阳赠李知枢序》，页237—239。

⑮据泉寿：〈朝鲜所藏的《明实录》〉称，大报坛废除之后，《明实录》藏于昌德宫奉谟堂。

⑯《李朝高宗实录》（东京：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，1956年）卷12，高宗12年12月初五日，页21。

⑰《李朝高宗实录》卷19，高宗19年8月30日，页207。

⑱光武帝：《御制皇明实录序》，转引小田省吾《半岛现存の皇明实录に就て——纂史餘録——》，《青丘学丛》第13号（昭和八年，1933年8月），页138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